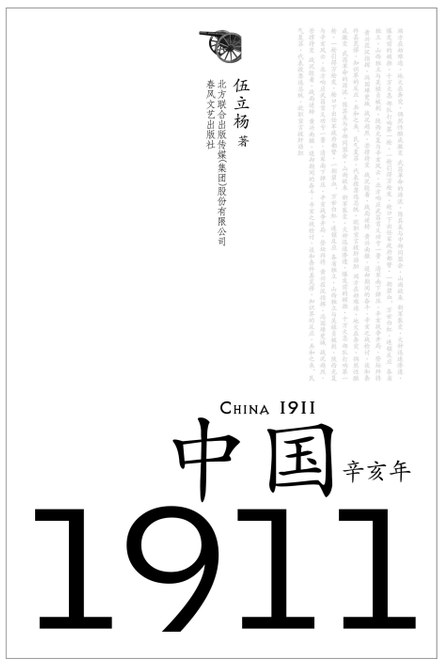
▼三味斋

个人幸福与社会很有关

□介子平



个人的幸福，除却与个人的现实状况有关外，与社会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何兆武在口述自传《上学记》中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另一处则再次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伍立杨在《中国1911》中对个人幸福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也作了阐述："政治清明，人心向善，民风淳朴；政治腐败，人心向恶，民风败坏。晚清数十年，人的道德底线是被统治者一次又一次突破的，所以当每一次人们认为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能够承受的事情，不能够接受的行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时，这种道德底线就一次又一次地被突破，这样在人群中就会有一定的人认同这个做法，或是潜意识地模仿这种做法……官权公然剥夺民权，强权肆意践踏人权，造成了大批流离失所的人群，官场腐败，贿赂公行，民不聊生。被压抑被憋屈得太久的民众，压力没有正常释放的途径，被迫对社会施以报复。"

晚清之际，多数革命党人，就个人角色而言，或出生官宦人家，或富裕大户，留学归来，任命要职，春秋正富，前程似锦，但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幸福，只因国家与社会如烂透的西瓜，脓液四溢，恶臭难闻。晚期已不仅仅是礼坏乐崩、教化失范、纲纪紊乱，而是窳劣猥鄙、积贫积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他们以死劝诫、蹈海自杀者有，毁家纾难、奋起暗杀者有。

陈天华于1905年12月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而亡，杨笃生于1911年8月在英国利物浦海口蹈海而死，原因皆在看不到国家的希望。1904年，陈天华在与黄兴筹备发动起义失败后，即表示"事不成，国灭种亡，活着也如同死了一样，何必求活命"。当时在反对日本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定的运动时，同盟会在斗争目的上出现严重分歧。激进派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而稳健派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两派斗争甚至到了水火不融的地步。陈天华遂决定以死劝诫，以成大事。他在《绝命辞》中写道："诸君更勿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的消息传至英国时，杨笃生绝望至极。8月6日，即他临死之前，将自己积蓄的几百英镑寄予黄兴，以支援革命。

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慷慨悲歌，前仆后继。有成功者，失手时更多，成功时同归于尽，失手则壮烈就义，成功不成功，皆大义凛然，一身担当，皆杀身成仁，名垂后世。杀一人固无济于事，但可借此以为天下先，可借此惊天地泣鬼神唤起民众。此行多为孙中山、黄兴、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喻云纪、汪精卫、徐锡麟、秋瑾、仇鳌、陈其美、陈炯明一类的知识分子。万福华早年居官，后弃官游历各省，暗结志士，倾向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从事反清革命。1904年夏，与人在南京组织暗杀团，谋刺户部侍郎铁良未果。同年11月在英租界刺杀广西路矿巡抚王之春未遂，被捕入狱。徐锡麟生于富商之家，少负奇气，踔厉风发，后在安徽巡警学堂经营校务，为巡警学堂会办兼巡警处会办，一月薪水几十银元，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1907年7月6日，在安徽巡警学堂首届毕业生典礼仪式上，儒雅的白面书生徐锡麟竟刺杀巡抚恩铭成功。徐被捕后，审讯者要他写供词，其提笔疾书数千言，满纸皆"杀尽贪官"、"推翻清廷"、"恢复中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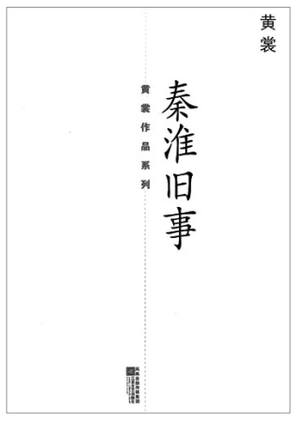
一腔热血，灌幸福之花，此幸福乃大幸福。舍身之不幸，对于追求大幸福的人而言，即解脱般的宁静。鲁迅先生《最先与最后》有言："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但他们是另类，正如鲁迅先生《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是"中国的脊梁"，这些有为青年，无一不是时代的担当者，而有责任，便有痛苦，责任愈大，痛苦愈深，深沉隐痛之下，何谈幸福！

（《中国1911》，伍立杨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新书品荐

主持：朱航满

黄裳作品系列：《秦淮旧事》《我的书斋》《书香琐记》《故人闲话》，张昌华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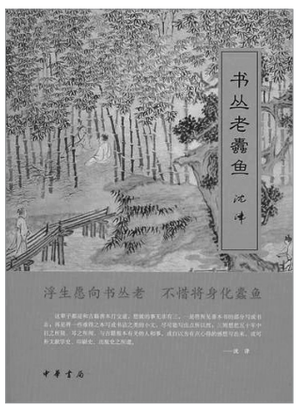


钱锺书曾称赞黄裳的文字"笔挟风霜，可畏亦复可爱"。通读黄裳的整个文集，最深的印象就是文风老到凌厉，无论在他早年的少作中，还是近年来的晚境新作中，均未有大的变化，所论有义正辞严处，常不容辩驳，诸如他早年的代表作《饯梅兰芳》与近年来最有代表的《第三条道路》，两篇文章均曾引起笔仗，但似乎又很难与其争辩。黄裳的文字多以随笔、游记、评论、序跋、书话等文章为主，能够从陈旧的故纸堆中阐发新见，他自述大学时代就对旧书及其版本发生了浓厚兴趣，从此用心搜求，积累了深厚的经验，愈到晚境，对于版本和文史的研究也就更见火候，特别是对明清历史及版本知识的研究，极有造诣。他曾对周作人的笔记资料有过不甚认同的论述，对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中有关资料的采集也有过非议，由此可见黄裳的可爱之处。在这个年代，凭借一人之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够达到的精深功力，黄裳可谓特例。

《林徽因与梁思成》（美），费慰梅著，成寒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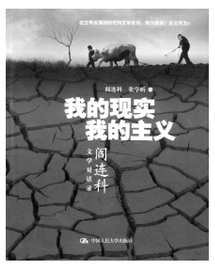
作为梁思成与林徽因共同的朋友，费慰梅（Wilma Fairbank）有着西方女性知识分子的特点，她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也是美国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学者.因此，她对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认识很有些与众不同。在其笔下，林徽因不仅仅是出身名门，受到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在建筑与文学上均有出色的天赋和才华；也不仅仅是她作为民国时代的传奇女性所具有的现代意义的美丽与优雅，更不全是她与徐志摩和金岳霖这两位杰出的诗人、学者的传奇韵事；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使得我们看到林徽因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作为"五四"之后的新女性代表，林徽因的真实生活状态，具有着非常典型的社会历史意义。因此，读完这册《林徽因与梁思成》，很觉得费慰梅的观察与思考，十分敏锐也十分独特，既有作为好友的亲近，也有作为学者的冷静，更有她作为女性的柔情。

《书丛老蠹鱼》，沈津著，中华书局2011年1月出版



沈津自称老蠹鱼，大半生埋首在古旧书丛中，满身沾染了太多遥远陈旧的历史尘埃，又长日灰头土脸地钻在残书断简的破落气氛中，想来也不是多么如意美满的好差事，但我却觉得他真幸福。据说美国纽约的全球第二大实体书店博德斯集团(BordersGroup)已经倒闭了，因为电子书的冲击太大。以后那种纯粹在书丛中埋首做蠹鱼的人，恐怕也要消失了吧。因此，真的很羡慕沈津，他作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的主任，每天接触的几乎都是古籍善本，在旧书丛中自在地做一个老蠹鱼，还是他自己的本职工作。其新作《书丛老蠹鱼》中，有他对于自己这独特人生的期许和努力："想做的事无非有三，一是将所见善本书的部分写成书志；再是将一些难得之本写成书话之类的小文，尽可能写出点所以然；三则想把五十年中目之所接、耳之所闻，与古籍版本有关的人和事，或自以为有点心得的感想写出来，或可补文献学史、印刷史、出版史之所遗。"

▼书 讯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是一本写作宣言，一次生命剖析，一场从土地出发的文学之旅。作者阎连科畅谈自己30年写作历程，细数笔下故事与人物的诞生，纵论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博尔赫斯、卡夫卡、苏童、莫言、余华、王安忆、贾平凹等数十位中外名家。在阎连科与评论家、翻译家的多次观点交锋中，勾绘出一幅文学图景。书中首次提出了"神实主义"创作观念，认为在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

（《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阎连科 张学昕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一个成功者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及的，金牌是凝聚了众多知名的或默默无闻的人们劳动、智慧的结晶。当胜利者登上领奖台时，感慨万千——奋斗足迹、成功的欢乐、失败的痛苦和心理上长期承受的巨大压力……把这些背后不为人知的惊心动魄、喜怒哀乐、儿女情长真实地记录下来，就有牵动人心的奇异力量。作者刘桀林长期从事体育新闻工作，潜心于竞技体育人物研究，以第一手独家材料书写出奥运明星不寻常的生活与经历，彰显出胜利背后的人性魅力。

（《成功可以复制·十五位冠军的成长经历》，刘桀林著，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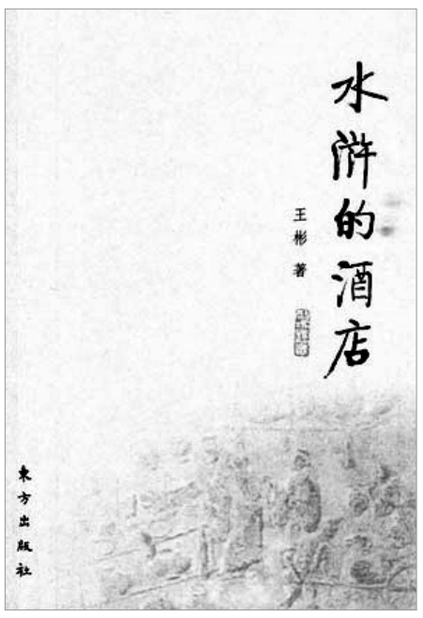
《天空上三公尺》是意大利作家穆恰1992年创作的小说，出版后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不仅缔造了200万册畅销佳绩，由此改编的电影更是引起流行风潮。当时意大利的年轻人纷纷效仿书中情节，于城市各角落涂鸦，表达对恋人的爱意。穆恰1963年生于罗马，身兼电影剧作家、电视编剧及导演。该书赢得了2004年卡斯特鲁乔文化贡献奖与罗马文学奖。

（《天空上三公尺》，穆恰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

▼方 法

实证批评的魅力

□陈晓明



王彬做批评多年，对叙事学研究有独到之处，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志研究颇多心得。他的批评显然与当今主流的学院理论批评颇不相同，他更接近传统的乾嘉学派一类的考据注疏。他的批评亦古亦今，新瓶老酒，味道醇厚，这是因为王彬在考据注疏中又加入批评分析，这就形成王彬独有的实证批评风格。他的言说如游龙走丝，枝节蔓延，最终切中要害。王彬已经出版多部著作，如《红楼梦叙事》《中国文学观念研究》《禁书·文字狱》《北京微观地理笔记》等。《水浒的酒店》就相当鲜明地体现了他独到的批评方法。

本书角度独特，以小见大。古往今来论《水浒传》的著作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从"酒店"的角度来论述水浒，十分新颖独特，是常人难以想到的主题。王彬通过阅读发现："在《水浒传》中，酒店作为事件的场所，引人注目。《水浒传》中的主要事件，基本是在酒店中发生的。可以说，没有酒店，便没有《水浒传》。"按王彬的梳理，《水浒传》几乎每一回都写到酒店，而且酒店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场所，是水浒发生故事的特定场所。据王彬考证，《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如武松、林冲、李逵、宋江、杨志、鲁智深等人，他们的命运均与酒店相关。同时，水浒的酒店出现得如此频繁，也说明北宋的酒店十分发达。王彬虽然未做进一步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考证，但他从文学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施耐庵处理酒店的手法，也就把水浒在某一方面的艺术特性揭示得很透彻。

《水浒传》写酒店确实写得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书中大抵写的都是江湖好汉，这些人无不血性阳刚，好酒贪杯，也就是说，总是生活于激情之中，难免酒后酿成大事。从酒店这一角度，揭示出水浒表现人物性格的方法，也使水浒人物总是处于戏剧性的边缘。那些在酒店里发生的故事，都十分生动精彩，而且都是重头戏，因此也都构成了故事各个关键环节。在酒店进行的事件，或者与暴力有关，或者与阴谋或复仇有关，或者与情欲有关，确实充满了戏剧性。

做学问的方法多种多样，做得充分、做到极致，都有自己的精彩。现在学院的主流学术，以论为主，学术训练也偏向于宏观的知识背景处理。但以小见大其实最难，要选择好角度，而且这一角度可以贯彻始终，能开掘深远，这就十分不易。看王彬选择酒店这一视角，不得不让人佩服。本书的论述周密细致，环环相扣。王彬的学问做得严谨缜密，看他原来做的《北京地理微观笔记》，也是做得精细入微，考据论说入情入理。这本书从结构体例上来说，并不是一个通论性质的著作，先论后续，可见他是先有心得，一发而不可收拾。但具体的论题，却是做得十分周密细致，其局部逻辑做得相当缜密。看这本书的第一章，论述了酒店作为事件的场所，而后论酒店的规模、经营、服务、种类、特殊作用，再有作为艺术的酒店。

以这种方式来研究一部作品其工作量之大，所花费的精力之巨，恐怕不是一般的研究能比肩的。我想，王彬把水浒大约是翻烂了几本。他在每一个论题下，可能都得重新翻一遍水浒。单说作为事件的场所一节，他要把每一回写到酒店的段落都要梳理一通。而要论述酒店的规模，他又要重新从不同角度研读水浒。王彬做学问的严谨认真还表现在，他在每一个论题下，都有对酒店的时空结构意识。也就是说，这些酒店在小说叙事中何时出现，所处的位置，与其他酒店之间的关系，在小说整体叙事中的作用等等，王彬在论述中始终有一幅清晰的地图。那些酒店在他的论述中，仿佛历历在目，就站立在那里，他能看到那里面的格局、摆设，水浒好汉在那里的所有的活动。他的论述错落有致，又前后呼应。

王彬做学问偏向考据，旧学根底颇深，故而本书涉猎的材料十分厚实，旁征博引，其引证的材料足以显示出王彬的学术训练。脚注里涉猎的典籍资料、野史笔记、民间杂说等，也都颇为丰厚，相互佐证，做得十分结实。读他写水浒酒店里惯用蒙汗药那一节，考证引述十分充足，让读者对蒙汗药有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按王彬的梳理，水浒里写蒙汗药有5次，写得相当精彩。蒙汗药到底为何物？是出自虚构，还是北宋那时真就有这种麻药。王彬的考据证实了水浒所写真实可靠，而且解药都是有的。

本书不只是论述了水浒叙事中的酒店，同时还对水浒中的人物展开社会分析，其分析方法依然是实证，从文本的具体例证出发，就事论事，甚至列出表格。有据才有理，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才可靠。读王彬的书，觉得他的言说朴素而扎实，诚恳而准确，平实中也感到他的内敛激情和神采飞扬，如此实证的批评文字，令人兴致盎然。

尽管我相当欣赏王彬的这种朴素扎实的批评风格，不过，我还是试图设想，如果王彬的叙事学再往新历史主义那方面靠靠，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以海登·怀特的那套文化唯物论的分析方法，或是文化政治的视角，来读解水浒酒店，那会建构起另一幅更加深远的水浒叙事背景。毛泽东当年说，"水浒好就好在投降"，毛泽东从水浒中看出了政治。我以为王彬的水浒酒店分析，再往前走一步，就触及到水浒的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大师阿兰·布鲁姆年轻时的处女作《莎士比亚的政治》，倒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参照。这当然不是王彬的硬性任务，而是中国古典和经典研究依然大有可为的方法论拓展。如何在实证分析中，再加入文化研究的视角，尤其是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可能是王彬学术方法给予的启示。

（《水浒的酒店》，王彬著，东方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纵 论

不能快意恩仇 那就奉陪到底

□江晓原

在一张叫做"地球"的大餐桌上，西方列强已经开怀享用很久了，他们的这种享用，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长期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之上的。现在中国人也坐到了这张大餐桌旁边，而且他们已经不敢公然强行将中国人赶走了，于是他们恐慌起来。桌边那些老牌列强们摸了摸腰间的手枪，悄悄交换着眼神，准备在餐桌上做好新的局，陷害这个后来者。

餐桌上是有基本游戏规则的，即使发起一场革命，也不能掀翻桌子。这个后来者应该怎么办呢？他腰间也有手枪，但这不是拍摄《英雄本色》的片场，他不能像周润发演的小马哥那样拔出枪来快意恩仇。所以他必须沉着冷静，艺高人胆大，与桌边的老牌列强们耐心周旋。要玩是吗？我可以奉陪，让我们玩到底，看谁最终出局！

就在这戏剧张力十足的时刻，有人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题目看上去有点大。《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在此之前就没有一本书能让人看懂世界格局吗？我想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这样咬文嚼字，因为在一本通俗著作中，将当今世界格局及其百年渊源娓娓道来，既能雅俗共赏，又能言之成理，以前确实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特别是，作者是一个此前尚无盛名的年轻人，就更让人刮目相看了。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快速崛起之际，弄明白今天的世界格局究竟是什么光景，这种格局又是依据什么条件而形成的，正在变成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按照本书作者的意见，形成今日世界格局的背后动力，一言以蔽之，都是经济。所有那些船坚炮利的故事背后，都有一本经济账。

第三世界的人们经常愤怒责问西方列强，为什么你们要在某些问题（比如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其实列强们从来只有一重标准——那就是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了这个利益，任何东西都可以朝秦暮楚云雨翻覆。今天的世界格局，完全是在各方实力的较量与平衡中建立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各方实力的消长而改变。中国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局面，几十年来的奋斗，比如抗美援朝、"两弹一星"、普及教育等等，实际上起了深远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崛起，虽然任重道远，却已曙光初现。明天，在这张叫做"地球"的大餐桌上，我们需要一个属于中国的新格局。为了这个新格局，我们今天就要认真做好准备。

（《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王伟著，南方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

优游方寸一雅士

□郑文政

林良明是我在台湾大学的学长。不过，我们却因集邮而结识。十多年前，我担任台湾邮政博物馆馆长，林学长常到博物馆来，或参观邮展，或参加邮展，也常参与邮友聚会，他不但对邮品（集邮票品）涉猎甚广，对集邮活动也相当投入。所以，我心目中的林良明是个优游于方寸世界中的雅士，是真正的集邮人。

林学长不但将法律专长贡献于金融界，也将学习法律的人的特质——细心、执著运用在收集邮票上。闲聊时他曾提及，自大学时代集邮迄今已40年，每月固定以收入的十分之一的预算购买邮品，且经常挑灯夜战整理邮集，纵使因而惹得太太又气又心疼也无怨无悔。学长对集邮用情之深，可见一斑。

有些集邮者以拥有邮票为满足，我常戏称这些人是"积邮家"。但是，林学长绝对是货真价实的"集邮家"，因为他除了经常参加邮展且屡获大奖外，还对自己收藏的邮品了如指掌，并经常撰文与邮友分享这些邮品背后精彩的故事。邮政总局发行的刊物——《今日邮政》中经常有他的大作，拜读之后，每每觉得获益良多。除了《今日邮政》外，其邮文也经常刊登于《联合报》《大明报》《讲义》及《合作金库月刊》上，是目前邮坛上少见的质量俱丰的作者。

林学长搜集邮品以中外文学、童话、西洋音乐、西洋绘画题材为主，其中尤以西洋绘画题材的邮品最叫人惊艳。数千枚几乎网罗各国所发行的以名画为题材的邮票，在他的整理安排下，井然有序，娓娓诉说着自14世纪以来西洋美术的发展史。欣赏邮票的同时，我们也认识了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洛可可时期，近代乃至现代，数百年来西洋绘画风格上的流转、画坛上的巨匠及令人赞叹的旷世画作。林学长将集邮的益处——怡情、益智、会友，发挥得淋漓尽致！就"会友"而言，他不但借着邮票、邮文和今人分享集邮的乐趣，也在整理邮品时神交古人，与邮票上的画坛大师共飨艺术的美宴。

（《邮票中的艺术史——西洋名画邮票之欣赏与收藏》，林良明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